

王鹏程,马红梅. 中国农民增收:政策作用与优化路径[J]. 江苏农业科学,2018,46(7):357-362.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07.085

中国农民增收:政策作用与优化路径

王鹏程¹, 马红梅^{1,2}

(1.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当前,国家关于实现农民增收出台了很多政策,也多次举办了相关会议。但在实现农民收入高速增长的目标上,这些国家政策还未达到最大效用。因此,从农民收入整体构成和农民收入内部构成 2 个角度,对实现农民增收的政策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对比分析出实现农民收入高速增长的瓶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路径。要实现农民增收必须提高农民个人综合素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有序推进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各项惠农补贴体制。

关键词:农民增收;政策作用;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8)07-0357-06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民的持续增收问题也逐渐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农民增收是与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及农民的消费水平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中央重要会议提到的“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促进农民增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对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有重要作用。因此对我国农民增收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已经出台并召开了许多农民增收的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包括“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历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这些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既涉及从农民收入整体角度,又有更具体的涉及农民收入内部构成角度来实现农民增收的政策手段。2000 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非常大,特别是 2004 年以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2004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 936 元,2015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 1 万元大关,达到 10 772 元。可见,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及召开的相关会议对农民增收产生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且国家政策在不断优化。但是对农民增收的政策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总结出经验与不

收稿日期:2017-08-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663012);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编号:研人文 2017037)。

作者简介:王鹏程(1990—),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经济研究。E-mail:734756441@qq.com。

通信作者:马红梅,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和区域经济等研究。E-mail:jixymhm@163.com。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业务的态度十分谨慎,恐怕由此会失去土地,而此状态实质就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的条件下,农户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我保护。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健全河南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把更多的农村家庭从对农村土地依附的状态下真正地、全面地解放出来,还原农村土地资产要素的基本属性。

参考文献:

- [1] 张庆君. 关于农村金融创新中土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思考——基于辽宁省法库县农村金融创新试点的实证观察[J]. 农村经济, 2010(11):64-66.
- [2] 沙龙云. 关于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工作的思考”——以吉林省为例[J]. 农村金融研究, 2013(2):44-47.
- [3] 孙杰光. 吉林省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运行情况调研报告——以梨树县为例[J].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3):24-28.
- [4] 孙建星,张苏珏. 吉林省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融资模式研究[J]. 农业发展与金融, 2014(7):27-29.
- [5] 张赛梅. 农村土地融资破冰四川井研县信用联社探索“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J]. 当代县域经济, 2014(4):72.

- [6] 杨利峰,胡 滨.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物权融资公司角度研究[J]. 银行家, 2016(9):107-108.
- [7] 张文汇.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融资模式[J]. 中国金融, 2014(8):75-77.
- [8] 郭明宇. 探索农村土地收益权担保贷款如何激活农村金融市场[J]. 山西农经, 2014(5):83-84.
- [9] 吴 真. 农村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风险考量和应对措施——以吉林省为例[J]. 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 2016(24):64-68.
- [10] 李 森. 全省推广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N]. 四川日报, 2015-06-27(002).
- [11] 臧晨旭. 张北县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调研报告[D]. 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 2015.
- [12] 刘炎周,张 虹,王玉峰. 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供给意愿实证研究——基于 316 名银行从业人员样本调查[J]. 广东农业科学, 2015, 42(17):159-166.
- [13] 荣泰生. AMOS 与研究方法[M]. 2 版.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14] Fornell C, Larcker D 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lgebra and statistic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3, 18(3):382-389.

足,以期找出进一步优化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也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本研究探讨了在原有农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如何继续优化这些政策文件,使其达到促进农民收入高速增长,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效果。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当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 2 个角度,即从农民收入整体视角研究农民增收和从农民收入内部结构视角研究农民增收。

第一,关于农民收入整体的角度,张红宇指出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可从 2 个角度、10 个方面着手:制度创新角度,包含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农村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和人力资本等 4 个方面的改革创新;政策创新角度,包含城镇化、农业产业的投入、农业生产的补贴、农产品的价格、农业保险的力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等 6 个方面的改革创新^[1]。制度创新方面,温涛等通过对发达国家农民增收政策和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现状的深入研究,指出需要进一步促进土地规模化、加快土地确权进程等来实现我国农民持续、稳定、快速增收^[2]。李玉中认为要通过增大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稳步推进农业经营制度和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同时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导向,构建农民培育的新机制等来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3]。刘谷金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创新的重要性,指出要通过人口素质提升工程和全民创业工程,全面提升农民的基本素质,增强农民的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实现农民能力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4]。政策创新方面,姚旭兵等运用门槛模型来研究城镇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指出应该在不同城镇化水平的省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更有效率地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进而缩小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5]。张重阳等认为要增大对农业产业的投入力度,促进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6]。姜长云指出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中长期政策选择,应坚持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发挥城镇化对农民就业、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7]。张红宇指出农产品的价格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直接因素,因此在各类政策工具中,价格政策对激励生产、保障农民收入的效果也最有效^[1]。李东坡认为减少农业产业成本,增强农业保险的力度,加快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8]。雷志敏将新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看作虚拟变量对金融发展进行研究,指出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以及降低农村贫困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据此提出要因地制宜、政策支持和全方位立体化地推动农村金融发展^[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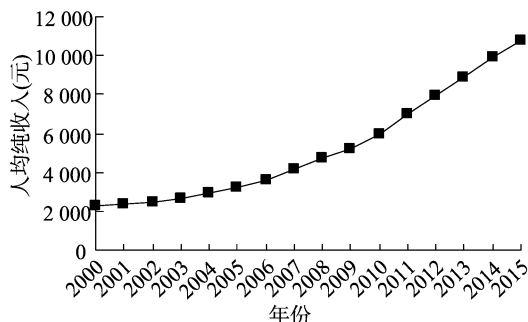
第二,关于农民收入内部构成项的角度。农民收入由 4 个部分构成,即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李子联认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应该继续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提高,稳步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大幅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有效促进农民转移性收入的提高^[10]。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方面,陈娟等认为农业科技进步对促进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要提高农业机械使用效率,增大对新型农机研发和农机推广的投入力度,增加对农业科技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对农业科技资金使用机制的创新等政策手段^[11]。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方面,曹飞在基于空间面板的方法对工资性收入

进行分析后,指出要通过促进非农经济发展,增大非农就业比重,加快路网构建,并合理引导农民进行人口城镇化等来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12]。促进财产性收入增长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群体通过土地征用、房屋租赁、金融理财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方式获得财产性收入^[13]。要部门联动、形成政策合力,从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发展^[14]、强化农民人力资本形成、完善城镇化的各项配套政策落实出发,持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15-16]。促进转移性收入增长方面,一方面,给予农民必要的资金及政策扶持,并积极鼓励农民注重对农产品的深加工,同时引导农民品牌意识的建设,深度挖掘农民持续增收的内在潜力。另一方面,优化政策资助结构,准确把握政策性农业保险,认真落实新增长农业保险的险种,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潜在风险的救助机制^[10,17]。

当前,学术界对实现我国农民增收各个视角的研究非常丰富,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多可借鉴之处。无论是从整体视角还是从各构成项视角对农民收入进行研究,都是围绕国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来实现农民持续增收,这些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对实现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巨大的作用。但无论是与同期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水平,还是与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我国农民收入都仍有较大差距,农民收入的增长程度还相对较慢。很多国家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足。对此,本研究提出改善和优化路径,力求找出更符合当前现状,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民持续增收的发展路径。

2 我国农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一路攀升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农民收入呈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在农民收入整体视角实现农民增收的政策内容方面,不同时期农民收入增长趋势有显著区别,同时不同时期国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对实现农民增收的侧重点也不完全一样。因此,综合考虑以上 2 个方面因素,根据 2000 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情况,将收入分成 3 个阶段。2000—2004 年,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 2 531 元,属于我国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阶段;2005—2011 年,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 4 827 元,属于我国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阶段;2012—2015 年,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 9 369 元,属于我国农民收入的中高速增长阶段。2000—2015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的具体情况见图 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6》

图1 2000—2015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基本情况

在农民收入的内部构成项方面,对 1990—2013 年农民纯收入各构成项的占比进行分析,由图 2 可知农民收入构成项

4 个方面对于农民收入贡献程度一直都有较大差异。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一直较低。从 1993 年至 2013 年,财产性收入最高占比 3.4% (2010 年),转移性收入最高占比 8.8% (2013 年)。农民收入主要构成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两者所占比重都较大,但其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程度有差异。1983 年以前工资性收入包括集体分配收入,所以在 1983 年前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一直高于家庭经营性收入,但在 1983 年后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开始高于工资性收入。直到 2013 年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第二次高于家庭经营性收入,2013 年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为 45.3%,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为 42.6%。

3 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演变

通过对国家政策关于农民增收内容的梳理发现,国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中既有针对整体农民收入增长,也有针对农民收入各构成部分增长来实现农民增收的政策手段。因此,本研究从这 2 个方面分别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

3.1 针对整体农民收入增长的视角

关于促进农民收入整体增加的方法措施有非常多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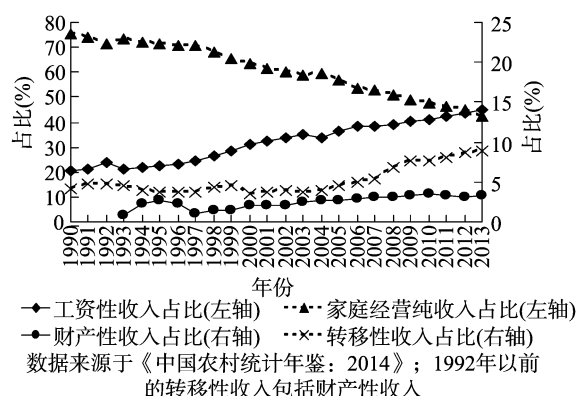


图2 1990—2013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趋势

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本研究综合考虑不同时期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和农民增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的侧重点这 2 个方面因素,采用前述分类方法,将 2000 年以来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分为 3 个阶段,并将相关政策文件、相关会议及其具体内容汇总,使不同时期农民增收的重点加以区分,更加清晰地呈现不同的政策内容(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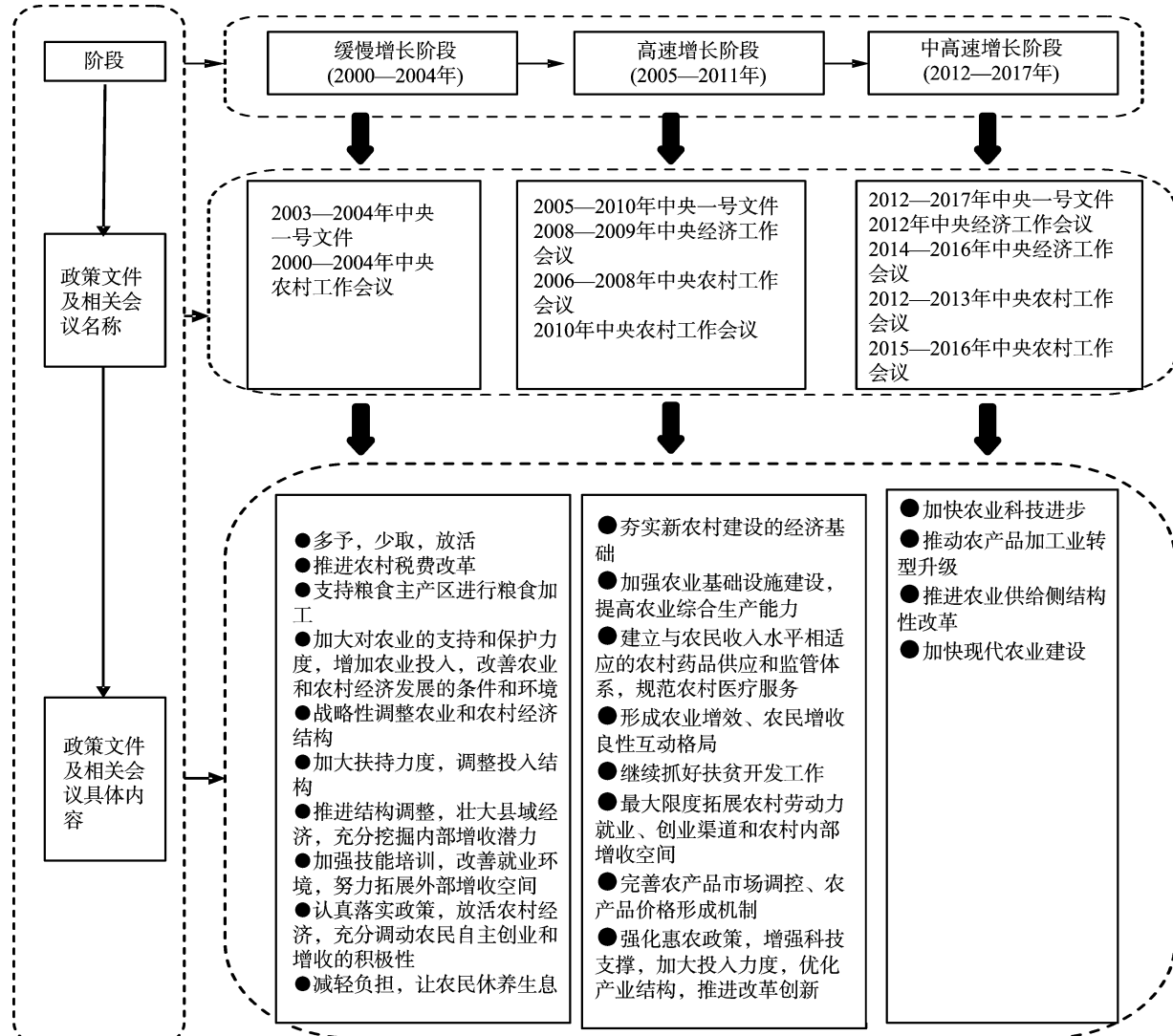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政策关于农民增收的内容

3.1.1 第一个阶段是 2000—2004 年,属于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阶段 2000 年农民纯收入 2 253.4 元,2004 年农民纯收入 2 936.4 元,4 年间农民纯收入仅增加了 683 元。这一阶段的农村政策主要围绕“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集中表现在 6 个方面:一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二是支持主产区对粮食进行转化及加工。三是增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四是推进结构调整,充分挖掘内部增长潜力。五是继续增大技能培训,努力拓展外部增收空间。六是充分调动农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 and 农民增收的积极性。

3.1.2 第二个阶段是 2005—2011 年,属于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阶段 2005 年农民纯收入 3 254.9 元,2011 年农民纯收入 6 977.3 元,6 年间农民纯收入增加了 3 722.4 元。这一阶段里,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实现了农民的持续增收。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农村政策主要围绕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的方针,集中表现在 5 个方面: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建立符合农民收入实际状况的农村药品供应及农村药品监管体系,优化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三是继续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四是最大限度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渠道和农村内部增收空间。五是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3.1.3 第三个阶段是 2012—2017 年,属于农民收入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2012 年农民纯收入 7 916.6 元,2015 年农民纯收入 10 772 元,在这 3 年里,农民纯收入增加了 2 855.4 元。2012 年以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农民收入的提高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农民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出现放缓迹象。这一阶段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二是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升级。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3.2 针对农民收入各构成的视角

关于农民收入各构成项部分实现农民增收的方法措施也有非常多的国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为了更加清晰地对反映出不同年份的侧重点,将不同年份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对农民收入各构成部分的提及情况进行了分类汇总(表 1)。

3.2.1 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 家庭经营性收入指农民在家庭经营中所获得的相关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通过农产品的买卖获得。由图 2 可知,家庭经营性收入总量较高,在农民收入的构成项中所占的比重也较高。1990 年以来,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项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这个占比却在逐年下降,从 1990 年的 75.6%,到 2000 年 63.3%,再到 2013 年的 42.6%,但总体上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大。因此在农民增收格局中,虽然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力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关于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政策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加大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开展规模;提高种地的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以及社会化服务水平;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的稳步提高。涉及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主要国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有“十二五”规划、2006—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2013—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2009—2010 年

表 1 国家政策中农民收入各构成项的提及情况

国家政策 (文件)	家庭经营性 收入	工资性 收入	财产性 收入	转移性 收入
“十二五”规划	√	√		√
“十三五”规划			√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				√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2008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
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				√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	√
2004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			
200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200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		
201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注:“√”表示提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3.2.2 工资性收入方面 工资性收入指的是劳务报酬收入,由 3 个方面构成,即农民工从业于非企业所得收入、农民工从业于本地企业所得收入、本地常住农村人口从业于外地所得收入。由图 2 可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构成项中所占比重较大,且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总量和所占比重都在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构成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0.2%,到 2000 年 31.2%,再到 2013 年的 45.3%。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增收格局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并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共同支撑农民收入构成项的最主要部分。国家关于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政策主要集中在 5 个方面: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增加以工代赈规模,切实促进农民劳务收入的增长;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农村创新创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体制;稳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涉及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国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有“十二五”规划、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2006—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2012—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2007—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3.2.3 财产性收入方面 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通过出让农民家庭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的财产使用权和营运权获得的收入。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总量和在农民收入的构成项中所占的比重都不高。由图 2 可知,1993 年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项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但因为财产性收入较低,财产性收入在农民增收格局中的地位同样不明显。国家关于促进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政策主要

集中在 3 个方面: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侧重完善对农民宅基地的管理,鼓励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等。涉及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国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有“十三五”规划、2008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 2015—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

3.2.4 转移性收入方面 转移性收入由 2 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提供的转移支付,这些团体主要是指国家、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另一方面是居民家庭彼此间收入的转移。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总量和在农民收入的构成项中所占的比重均不高。由图 2 可知,1993 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 41.6 元,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 4.5%;2000 年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加到 78.8 元,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 3.5%;1993—2007 年以来,农民转移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的占比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但财产性收入总量不高。2007 年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 5.4%,到 2008 年,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加到 323.2 元,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 6.8%。其后一直到 2013 年一直保持较高的占比。因其总量不高在农民增收格局中的地位还不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财产

性收入。国家政策中促进转移性收入增长的政策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和报销水平以及增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涉及转移性收入的主要国家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有“十二五”规划、2004—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 2004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4 实现农民增收的瓶颈

农民收入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增长状态,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及相关会议对实现农民增收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实现农民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还是存在较多瓶颈,这些瓶颈主要来自农民收入各构成项的制约:由于文化素质低、职业技能缺乏,农民市民化程度低,农民流动受阻,工资水平较低对工资性收入的制约;由于文化素质低、职业技能缺乏,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农民流动受阻,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较低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制约;农用地、宅基地和房屋的产权不明晰对财产性收入的制约;补贴政策作用受限所导致的转移性收入的制约(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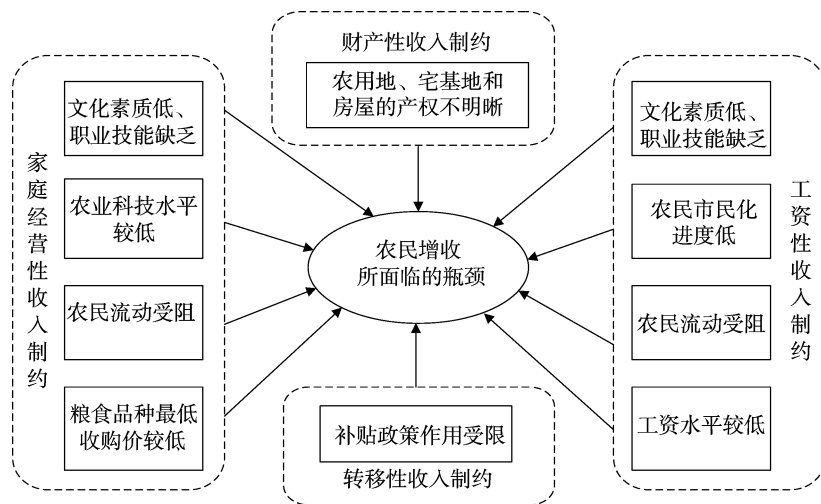


图4 农民增收所面临的瓶颈

4.1 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制约

我国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农业技术培训,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接受能力较差。同时农业科技水平较低也是制约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技水平决定着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的成本,科技水平较高可以促进农业产出总量以及质量的提升,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而户籍管制在城镇和农村间人为建立起的分割线,对农民从农村向城镇的自由流动产生了很大阻碍作用,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和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严重阻碍了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提高。除此之外,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水平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当前的粮食最低收购价还较低,农民从其中获得的收益较少。

4.2 工资性收入的制约

由于绝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较低,并且缺乏专业技能培训,因此只能选择技术含量低、操作工序单一的基础行业,以

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为主。而这一类工作,工资报酬往往较低,农民从中获得的收入也相对有限。同时农民市民化程度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有效转移。农民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城市户籍,要遭遇人工成本高企、不断增加的大学毕业生和城市再就业人员的竞争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等多重困境,流动非常受限。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农民工资水平较低,造成工资性收入受到制约。只有突破这些因素造成的制约,才能稳定地实现农民工资性收入的较快增长。

4.3 财产性收入的制约

农用地、宅基地和房屋的产权不明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用地、宅基地和房屋。而农民是否能获得财产性收益,主要取决于土地和房屋的产权,即收益权、处置权和所有权。但实际上,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土地权属关系不够明晰,导致农民土地和房屋产权缺失,这使农民在农用地、宅基地和房屋方面的收益受到影响,且难以得到保障。保障农民利益,必须进一步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从根本

上明晰土地权属关系,是农民稳定持续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前提。

4.4 转移性收入的制约

虽然政府针对农民增收的补贴政策较多,但是给农民带来的直接收益却很少,并且这种收益不能再带来其他新的收益。比如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可以更直接地使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升。不仅是工资、劳务的增加,更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才是真正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但若只是转移性收入,就无法带来这种持续的促进作用。

5 促进农民增收的路径优化

实现农民增收,就要加快促进和保障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确保农民财产性收入加速增长,确保转移性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就要做到提高农民个人综合素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各项惠农补贴体制。

5.1 提高农民个人综合素质,促进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加大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投入力度,增强农民外出择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提高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和就业稳定性及实现农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撑,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培养文化素养高、技术能力强、经营管理能力强的新型农民,继续有针对性地加大农民科技培训扶持力度,切实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

5.2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民在城乡间有序流动,继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进行转移。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转移过程中的成本,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不断扩大非农就业规模,使其在城市中获得更多、更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同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工资的增长机制,切实地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提供有力保障,保障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持续增长。

5.3 加快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保障家庭经营性收入稳定增长

加快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增大对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新型农业机械研发和推广等的投入力度,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同时,注重良种培育,促进土地产出率的提高;改善农业技术装备状况,促进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提升农民生产技术水平,增大劳动生产率;继续深化粮食收购政策的市场化改革,保障家庭经营性收入稳定增长。

5.4 有序推进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确保农民财产性收入加速增长

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明晰权属关系,破除农民在农用地、宅基地和房屋上获得收益的一系列障碍。保证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同时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

而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整体提高,确保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加速增长,为实现农民增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5.5 完善各项惠农补贴体制,确保转移性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

完善各项惠农补贴体制,确保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全面落实。提升我国农业产品质量,开拓农业可持续发展空间,使农产品的供给结构更加灵活,确保农业基础的稳固。另外,改变各项惠农补贴体制对农民收入促进的方式,从农民转移性收入长期增长的角度出发,以能够促进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的补贴手段,消除粮食直补政策中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因素,确保转移性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 [1] 张红宇. 新常态下的农民收入问题[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4): 25-28.
- [2] 温涛, 王汉杰, 王小华. 发达国家农民增收经济政策的经验比较及启示[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5(6): 84-94.
- [3] 李玉中. 新常态下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研究[J]. 中州学刊, 2015(10): 49-53.
- [4] 刘谷金, 龙立珍. “十二五”湖南农民收入倍增途径探讨[J]. 调研世界, 2012(9): 24-27.
- [5] 姚旭兵, 罗光强. 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15(7): 97-103.
- [6] 张重阳, 路洪海. 我国农民增收问题探析[J]. 商业研究, 2008(5): 170-173.
- [7] 姜长云. 中国农民增收现状及其中长期影响因素[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4): 5-13.
- [8] 李东坡. 中央惠农政策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以河南省商丘地区为例[J]. 湖北社会科学, 2011(7): 57-59.
- [9] 雷志敏. 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研究[J]. 理论探讨, 2013(4): 80-84.
- [10] 李子联.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 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J]. 经济评论, 2014(3): 16-25.
- [11] 陈娟, 杜兴端.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实证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4(6): 49-54.
- [12] 曹飞. 中国省城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城镇化的空间面板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44(5): 8-14.
- [13] 丁静. 土地制度改革: 农民工市民化的“助推器”[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4(4): 50-53.
- [14] 杨海宁, 曲振涛. 中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演化趋势与提升路径研究[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6(3): 115-119.
- [15] 杨海宁, 李小丽. 城镇化进程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探讨[J]. 学术交流, 2016(12): 129-134.
- [16] 刘淑清. 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思考[J]. 经济问题, 2014(7): 90-93.
- [17] 任利军. 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2.